

近代汉语语音 研究简史

陈年高/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简史

陈年高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简史/陈年高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06-04721-1

I.近… II.陈… III.汉语—语音—研究—近代
IV.H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5522 号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简史

著 者:陈年高

责任编辑:谷艳秋 封面设计:孙 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721-1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本书所说的近代汉语，其上限在晚唐五代，下限在清代初年。当然晚唐至清初只是个大概，有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将上限上移一点或将下限后延一点（参看袁宾《近代汉语概论》“绪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这是汉语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相对于中古音系，此期的汉语语音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如，全浊声母的清化，尖团合流，儿化韵的产生，-m 韵尾的消失，四声的消变等等。中古汉语的流和现代汉语的源，全在这近千年的时间长河中，探索上述及其他各项重要音变的发生时间、方式、路线，以及描述当时汉语语音的组织面貌，就成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或曰近代语音研究）的重要内容。

20 世纪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20 年代，开始引起学界注意；30 - 40 年代及 50 - 60 年代是初步发展；1977 - 2000 年，则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近 80 年来，近代语音研究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取得了多方面的较大进展，其成就引人瞩目。主要体现在：

（1）相当成功地勾画出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发展轮廓。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汉语共同语语音的基本面貌，从李新魁《宋代汉语韵母系统研究》（1988）、《宋代汉语声母系统研究》（1990）、杨耐思《元代汉语的标准音》（1996）、叶宝奎《〈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系》（1994）、《明清官话音系》（1998）、《谈清代汉语标准音》（1998）等专论中，就可以看到大概。同时，对近代汉语声韵

调等方面的重要音变，展开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共识。

(2) 各个阶段中重要而典型的语料基本上都有深入的研究，其中个别语料，如《中原音韵》竟发展成为近代汉语的显学之一。研究《中原音韵》的专著即有 10 余部，以《中原音韵》为重点讨论对象的通论性著作近 20 部，单篇论文 100 余篇。另如龙果夫对元代八思巴字的语音研究，陆志韦对近代几部官话韵书的研究，鲁国尧对《全宋词》的分韵研究，都体现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材料的开拓和深入。

(3) 近代地点方音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从唐五代及宋代西北方音的研究，宋代汴洛音的研究，北方官话地区语音的研究，进而扩展到江浙地区的方音及官话音的研究，从普通地点方音到作为官话基础方音的研究，都有可资借鉴的优秀成果问世。

可以说，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在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都已经具备了继续深入的坚实基础和学术储备。问题是在进一步钻研本体材料、促进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更上一层楼之前，必须总结以往的研究经历，消化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以达到从中借取经验，发现不足，调整方向，整合人力的目的。在近代语音研究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这些成果和经验所蕴含的价值将会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而得到充分体现。事实证明，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适时吸取已有学术营养的基础之上才取得的。然而，对这份相当重要的工作，我们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并不多，目前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史》。本书即为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期望它能为介绍并推广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本书考察的时间主要从 20 世纪初期至 2000 年，空间上则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兼及港台地区，对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目前力所能及地予以介绍。全书共分 7 章，第 1 章是对 20 世纪前的近代汉语语音情况进行的概述，第 2、3 章分别为分时代和分专题的研究

情况，也都是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纵向考察，通过这两章，大致可以看到近代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脉络；第4章是对近代语音共同语和方音研究的简单回顾；第5章是对近代语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音学研究的初步总结；第6、7两章分别是讲近代汉语研究材料和方法的，实际上这两章的内容大多已经隐含在此前各章所述的具体研究当中了，这里单独抽出，主要为了彰显材料及方法在研究的重要性。各章内容及分类上相互交叉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北音学与元明清三代的语音研究，等韵学和语音史的研究，等等。

本书旨在介绍各家研究，尽量忠实于原作，对原作者的观点不作引申发挥，纯作“摆事实”的努力。但由于近代语音研究牵涉面广而杂，如何剪裁协调各部类的研究内容，各种著述之间如何取舍，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限于个人见闻和学力，本书疏漏谬误之处，肯定不少，敬祈垂教。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以前近代汉语语音研究述略	(1)
第二章 语音史的研究 (上): 历代音系	(13)
第一节 晚唐五代语音的研究	(14)
第二节 宋代语音的研究	(23)
第三节 元代语音的研究	(32)
第四节 明代语音的研究	(50)
第五节 清代语音的研究	(57)
第三章 语音史的研究 (下): 声韵调的发展	(64)
第一节 声母系统的研究	(64)
第二节 韵母系统的研究	(72)
第三节 声调系统的研究	(83)
第四章 近代汉语共同语和方音的研究	(90)
第一节 近代汉语共同语的研究	(90)
第二节 近代汉语方音的研究	(106)

第五章 北音学的研究	(143)
第一节 北音学概述	(143)
第二节 其他北音韵书的研究	(157)
第六章 等韵学的研究	(168)
第一节 等韵源流的研究	(168)
第二节 等韵图的研究	(181)
第三节 关于几本等韵学著作的介绍	(193)
第七章 近代语音文献整理与语音研究方法	(197)
第一节 语音文献的整理	(197)
第二节 语音研究的方法	(203)
第八章 近代汉语语音论著目录	(214)
后 记	(271)

第一章 20 世纪前的近代汉语 语音研究述略

应该说, 20 世纪以前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一开始就伴随和体现在近代汉语语音自身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这本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说明: 首先是近代汉语语音资料的创作和积累, 在近代汉语时期就从未间断过。如各个时期能够反映口语情况的文学创作, 唐诗宋词元曲, 以及唐以后盛行的音注活动, 无一例外地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准备了难得的资料。其次是相关的自觉的语音分析描写工作, 从唐代至清, 更是薪火相传, 绵延不绝。特别是自唐代开始的编制韵图和韵书, 以及后来的有关方音描写的学术活动, 生动反映了编写者的某种语音自觉意识及其研究成果。

然而, 有时积累资料和语音分析这两项工作, 并不是一分为二、界限分明的(除了一些诗词等文学作品)。就上述第二点来说, 实际上它们既是后人的研究资料, 又是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鉴于此, 我们重点介绍古人在《中原音韵》、明清韵图、方音及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一、《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成于元泰定甲子年(1324), 作者周德清系江西高安人。此书是近代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它的音系是近代汉语具有代表性的音系。《中原音韵》宣称“欲正言语, 必宗中原之音”, 即本诸中原语音, 规范当时的北曲创作, 所以它的音系和

《切韵》相比，差别巨大，具体说有：声调上平分阴阳，入派三声；韵分 19 部，最大特点是划分出支思、恒欢、家麻三韵；声母的数目只有 20 个，无全浊声母（参见王力 1981《中国语言学史》78—82 页）。这种凭实际语音审音定韵的做法，也得到了与周德清同时代的学者李祁的充分肯定：“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德清之所以能为此者，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乐府，故能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类字。而其说皆本于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而为之也”（《中原音韵·序》）。可以说，《中原音韵》的问世，本身就是近代语音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中原音韵》本为曲韵之书，它在戏曲界的影响相当大，以至于“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明王骥德《曲律》卷二）。因此，研究《中原音韵》的，首先就是明清时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下面我们以张斌、许威汉主编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音韵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里的材料为主，择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由于这些人对如何从口语出发进行辨韵析字，有着相当丰富而细致的实践经验，他们对汉字分韵的不少看法在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意义，这可分从三方面来叙说。

（1）如关于《中原音韵》的闭口韵问题。清刘禧延《中州切韵谱赘论》曾说：

（侵寻、监咸、廉纤）三韵中所有唇音字，如‘稟品泛凡范贬’之类，《中原音韵》诸书皆分入他韵（品入真文，稟入庚青，凡泛范入寒山，贬入先天。）盖此数字出音已合唇，若再闭口收，音似未纯，故分移于抵腭鼻音，此亦权宜之法。今人于此三部，皆不知闭口音，与真文、寒山、先天、庚青，漫无区别，可如此通融。前人分入他韵，殊无谓矣。

应该指出，刘氏认为《中原音韵》分韵时应该保存闭口韵，忽视了此书的现实语音基础，以及语音变化的客观性。但他认为唇音字的

-m 尾向 -n 尾（抵腭鼻音）的演变有音理上的必然性，是符合音变原则的。

（2）关于《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明清学者在讨论韵部分合时也有论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北音说。上文的刘禧延就认为：

《中原音韵》原十九部，后人于齐微、鱼模中分两部，以微与灰，鱼与模显分两音也。然就北音而论，飞读如弗威切，肥读如佛韦切，皮读如裴（唇音），微读如为（唇音混入喉音）；鱼模则书读叔乌切，朱读竹乌切，樗读触乌切，除读逐乎切（齿音），此类不可枚举。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为二，固合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

这显然是站在“北音”的立场上说话的，认为《中原音韵》应以北音的实际读法来合并一些韵部。

另一是拼凑说。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字伯良）在《曲律》卷二中，谓《中原音韵》不过是“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

盖周（德清）之为韵，其功不在于合而在于分；而分之中犹有未尽然者。如江阳之于邦王，齐微之于归回，鱼居之于模吴，真亲之于文门，先天之于鹃元，试细呼之，殊自径庭，皆所宜更析。而其合不经者，平声如肱、轰、兄、崩、烹、盲、弘、鹏，旧属庚青蒸三韵，而今两收东钟韵中；浮与蜉蝣之蜉同音，在《说文》亦作缚牟切，今却收入鱼模韵中，音之为扶，而于尤侯本韵，竟并其字削去。

而他的立论基础则是以身论人，认为周德清系“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远”，“安保其无离而不叶于正音哉”！（明·王骥德《曲律·卷二·论韵第七》，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

总的来看，此时学者们关于《中原音韵》分韵是否宗于“北

音”的讨论还不免带有经验性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动机基本上还是如何服务于戏曲创作，但所有这些论说无疑都是对汉语语音史的有益阐述。

(3) 关于入声问题。由于入声被视为曲中“甘草”，它的有无事关重大，无论北曲还是南曲，都要好好钻研。这种研究上的内在需要极大推动了对《中原音韵》入声问题的探讨。为便于叙述，暂且根据论者倾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原音韵》仍存入声，一是元代“北音”入声已失。

第一种意见的支持者很多。明代方以智《通雅·小学大略》就说：“《中原音韵》……其平分阴阳，前所未发也；入派三声者，广其韵耳。张萱谓之北雅。智谓北人未尝无入声也。”明葛中选《泰律篇》卷十二也说：“周德清以入声派入三声，直用填辞。推其原，亦为箫管度曲之便，乃以是为中原雅音，何其谬也！”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吕坤《交泰韵》、梁廷枏《曲话》等，都有过类似的看法。

至于何谓“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清代戈载《词林正韵》“发凡”第四条曾并加以解释，他说：“制曲用韵，可以平上去通押，且无入声。如周德清《中原音韵》列东钟、江阳等十九韵，入声则以之配隶三声，例曰‘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以予推之，入为瘠，欲调曼声，必谐三声，故凡入声之正次清音转上声，正浊作平，次浊作去，随音转叶，始有所归耳。高安（引按指周德清）虽未明言其理，以予测其大略如此。”今人宁忌浮认为，戈载这段话算是最早揭示入派三声规律的议论（《中原音韵表稿》170页）。

方氏等人的话头差不多都是根据周德清《正语作词起例》里的那段话所作的引申或发挥（“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为此，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后来主张《中原音韵》有入声的人，也“照章办事”，因为这是周德清本人的话，作为内证，当然力量很大（理解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

持第二种意见的，可用两个人为例来说明。明代王世贞《王氏

曲藻·序》云：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但大江以北，渐染吴语，时时采入，而沈约四声，遂阙其一。（任中敏编《新曲选·第六种》，中华书局 1940 年聚珍仿宋印本，1 册 1 页）

这应该是较早主张《中原音韵》时期的北曲没有入声的观点。

后来清代毛先舒推而广之，认为北曲赖以存在的北音也无入声：“北之入作平上去，方音也。北人口语无入声，凡入声皆作平上去呼之，即如‘穀’字，北人呼为‘古’，北曲自应从北音，故《中原音韵》‘穀’字以入当作上，而音‘古’，凡入声皆然。”（任中敏编《新曲选·第十八种》4 册 2 页）同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中原音韵》“盖全为北曲而作”，北音舒长迟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声，凡三声皆读入三声，自其风土使然。”（卷 199，中华书局，1965 年版，1828 页）都是从基础方言的角度来说明《中原音韵》之所以无入声的道理。

以上关于《中原音韵》有无入声的两种观点，各有理据，互不相下。直到今天，这个入声问题还是让人困扰不已的“老大难”。

二、其他便俗韵图

除了《中原音韵》，古人对近代语音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还在于他们运用等韵学理而编制的大量反映时音的等韵图，尤其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便俗韵图。韵图既是古人研究语音的手段，也是重要的语音分析的成果。据今人研究，宋元时代的等韵图中，有以反映中古韵书音系的《韵镜》、《七音略》，更有逐渐归并韵书韵类、反映实际语音的《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等。其中产生于南宋的《切韵指掌图》较有革崖精神，它表面上用《广韵》206 韵部，内里实有许多变化（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85 - 186 页）；

(1) 冬、东三与鍾、鱼与虞、尤与幽、覃与谈、衍与咸、盐与严凡等韵部合并；

(2) 许多三等韵字列入四等韵地位，三四等韵合一；

(3) 支之韵的精照系字列于一等，表明产生了 [ɿ]；

(4) 桓韵列为寒韵合口，可见桓韵已读 [uan]；

(5) 以入声兼承阴阳，入声韵的收音已变为 [-ʔ]，等等。

至于《四声等子》，今人唐作藩《四声等子研究》(1989)以为，它的韵母系统除入声韵外，已“十分接近《中原音韵》了”。

这种以韵图形式展示实际语音的研究，到了明清时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清两代产生的许多重要韵图与宋元韵图相比，都更注重对时音的分析。据今人李新魁《汉语等韵学》的研究，所见明清 114 种等韵图中，仅有 15 种是研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其余 99 种都是表现时音或部分表现时音的。这 99 种韵图中，反映当时读书音的 41 种，如《韵学集成》(《音韵阐微》)所附韵图、《字学元元》、《韵法直图》及《韵法横图》等，其音系特点是保存全浊声母，有“官”与“关”、“艰”与“坚”的对立，以及带有人声等。其中反映口语标准音的是《青郊杂著》、《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交泰韵》、《五方元音》、《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字母切韵要法》等，共计 27 种；表现方音的有 12 种，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等韵便读》等；系表南北方音的 6 种，如《李氏音鉴》等。还有“显示语音骨架”和“调和新旧音”的韵图共 13 种。这些韵图“不以拘守韵书中的反切为要务，而是参用实际语音来编制韵图，变原来的四等、两呼为四呼（或五呼、六呼不等）”。这些韵图不仅开了等韵学的新天地，而且为明清时期汉语音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成果，成为后人构拟明清语音的最重要依据。

此外，古人还有留下大量关于某些具体音变现象的零星论述，尽管片光吉羽，仍值得珍视。例如，晚唐李涪《切韵刊误》中，有

批评《切韵》音“东冬”有分、“全浊上、去”有分的话：

（陆）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恨戾之恨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李涪《刊误》卷下）

清代戴震曾注意到这个材料，并加以评析：“（李）涪去法言未远，已读‘东’‘冬’如一，‘中’‘终’如一，讥其妄别矣。又今人语言，矢口而出，作去声者，《广韵》多在上声；作上声者，《广韵》多在去声。……是今人与《广韵》互异者，非后代始流变，在唐人已经语言与韵书互异矣。”（《答段若膺论韵》，《戴震集》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近人王国维也依据这话，认为反映唐时语音的韵书中，存在“并部一派”（《观堂集林》卷八）。

再如清代刘禧延还讨论过“非敷”二母何以合流的问题。他说：“非敷二母，等韵明分纯清次清，……不知何时始读非如菲，方如芳，分如芬，如此类者，竟混非敷为一母，概无轻唇之纯清音。……到合唇成字，易近重浊，其轻唇之纯清者，稍纵即涉于次清，此非敷之所以无别也。”刘氏虽未按断“非敷”合一的发生年代，但对发生此现象的音理依据，却有正确的说明。

三、方音的关注

今人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1933）一文详细评述了“前人对于方音研究的贡献”，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近代汉语范围的。罗氏将前人贡献分作两个方面，一是“从传记杂纂中钩稽方音材料的。”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声相近而讹”条：

李匡文《资暇集》：今人谓‘帽’为‘幕’，‘保’为‘补’（今北人读堡为补，唐时盖已然。）‘褰’为‘逋’，‘暴’为

‘步’；此由豪韵转入模韵也。黄州呼‘醉’为‘沮’，呼‘吟’为‘垠’（逆斤切，《明道杂志》）；秦声谓‘虫’为‘程’（同上）。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癸辛杂识》，黄匣母，王喻母），又“元时方音”条：“《古今韵会举要》谓：‘恤’与‘肃’同，‘怵’与‘祝’同，‘出’与‘烛’同，……‘弗’与‘福’同……‘屈’与‘曲’同……‘窟’与‘哭’同……‘忽’与‘穀’同；皆不合于古音，证之今音，亦多龃龉，殆元时方音也。《辍耕录》云：‘今中前之韵，入声似平，又可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另一方面则“大体都是拿‘当代的’活语言作对象”的。这又可大致分为下列四种情形。

(1) 是出于好奇或质疑而随手记录的。宋欧阳修《归田录》云：“遍检字书，乃无此打字音丁雅者，其义主考击之打，自言谪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谪耿为是。不知何因转为丁雅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云：“打字音丁梗反……吴音也。”朱熹也云：“打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今人周祖谟《宋代方音》一文录有论方音的宋人笔记若干则，上打字条即在其中。

(2) 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正音，而胪列各地方音，以观其异同的。如明张位《问奇集》云：“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并列举“燕赵”、“秦晋”、“梁宋”、“齐鲁”、“西蜀”、“吴越”、“三楚”、“闽粤”等八个地方的方音。清潘耒《类音》、李汝珍《李氏音鉴》中均有“南北（方）音论”一类的内容。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卷七“方音分类谱略便”以其“桑梓乡音”（主要是金陵音）为标准，比较了远至闽粤、近到扬州、镇江、徐州、安庆、桐城等地的音类异同，认为“由是推之，则用金陵方音可识闽音，更何方音之难识乎”。胡氏并想编

《方音互易谱》、《方音补字谱》、《方音变易寻源谱》、《童音谱》及《方音入声谱》等。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杂论》中也讨论了“以南北为大界”的方音异同。上述诸家除张位是近于客观的比较外，其他则主要是着眼于观其异同、期于南北融通。而像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所谓“天下音韵多谬”、袁子让《字学元元》卷入所谓“方语呼音之谬”、“方语呼声之讹”以及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所谓“声相近而讹”之类，也都谈到各地乡音的点滴情形，却“是从以韵书矫正方音的立场来说话，并不是为方音而研究方音”（罗常培语）。

(3) 以当前方音为出发点而求证古今变迁的。清陈澧《东塾集·广州音说》认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陈氏共举五“善”，其中“又以四声皆分清浊为最善。”结论是“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六也谈到杭州话的音变问题，他说：“城中（引按，指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御（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劲，为杭人之旧音。”

(4) 就是明末清初以来涌现的方音韵书，它们多以表现各地方音为事，地域性强，特点明显。比如，福州人晋安于乾隆十四年（1749）刊刻的《戚林八音》，是据称明戚继光所编《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和清代林碧山所编《珠玉同声》的合编。它们反映的是明末的福州音。这两部书是“为当时群众学习拼切字音、掌握切音方法、学习方言、认识汉字服务的”（李新魁，《汉语等韵学》，349页）。其中戚氏书有韵母 36 类，声调 8 类。声母是 15 个，用四句话表示：“柳边求气低，波他曾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这就是后来闽粤一带流行的“十五音”一脉方言韵书的滥觞。

尤值一提的是，清初刘献廷还主张用一定的方法，调查各地方